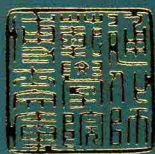


孙放远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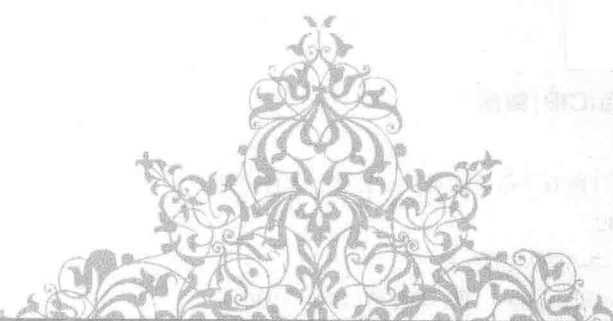
Lu Xun
and Natsume Soseki

鲁迅与夏目漱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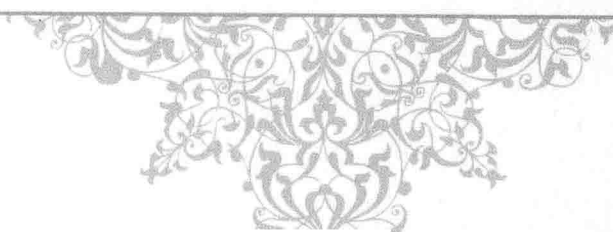
 吉林大学出版社

通化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鲁迅与夏目漱石

孙放远/著



吉林
大学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与夏目漱石 / 孙放远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677-2710-6

I. ①鲁… II. ①孙… III. ①鲁迅(1881~1936)-人物研究②鲁迅著作研究③夏目漱石(1867~1916)-人物研究④夏目漱石(1867~1916)-文学研究 IV. ①K825.6②I210.97③K833.135.6④I313.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1780 号

鲁迅与夏目漱石

孙放远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马宁徽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2 字数：200 千字

ISBN 978-7-5677-2710-6

封面设计：张沐沉

长春科普快速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014 年 12 月 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9580026/28/29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绪 论

鲁迅 (1881—1936), 原名周树人, 字豫才, 浙江绍兴人。夏目漱石 (1867—1916), 原名夏目金之助, 出生于日本东京一个小官吏家庭。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对中国现当代的一些重要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目漱石是日本 20 世纪初文坛巨匠, 对其后的日本文学影响极大。鲁迅很喜爱夏目漱石的作品,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夏目漱石的影响。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 1907 年前后, 也就是他弃医从文、从仙台到东京的时候, 在日本作家中, 他最欣赏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 是俄国的果戈里 (N. Gogol) 和波兰的显克微支 (H. Sienkiewicz)。日本的, 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1]511} 在日本留学时期, 他很少看日本文学作品, 但对漱石的作品却尽量买来读, 如《我是猫》、《漾虚集》等等。鲁迅晚年, 《漱石全集》(岩波版) 发行之际, 鲁迅就通过上海的内山书店购入, 在他逝世前十日还有漱石的新书到手。鲁迅和夏目漱石渊源深远, 成为研究他们之间关系的坚实基础。

一、选题意义

关于鲁迅与夏目漱石的比较研究, 虽然已有不少成果, 但有些方面还没有论及。如: 鲁迅与夏目漱石对于老庄思想的认同与超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桧山久雄的《鲁迅与漱石》中虽然提及, 但也没有深入分析。1926 年, 为授课之需, 鲁迅撰写了《中国文学史略》, 后改名为《汉文学史纲要》, 其中对“老庄”作了单章论述, 鲁迅晚年创作的小说《出关》、《起死》分别以老子和庄子为主人公。夏目漱石 1892 年 6 月作为东京大学文学部英文科的学生, 写出论文《老子哲学》, 漱石非常重要的思想“则天去私”也显示了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痕迹。从这个角度比较鲁迅

与夏目漱石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再如：鲁迅与夏目漱石关于反讽思想的比较，是一个新问题，未见有前人论及。反讽的研究在目前的学术界很热。关于“反讽”的博士论文，2006年以来共有3篇，分别是：陈振华的《中国新时期小说反讽叙事论》（山东师范大学，2006）；臧运峰的《新批评反讽及其现代神话》（北京师范大学，2007）；龚敏律的《西方反讽诗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湖南师范大学，2008）。反讽不仅具有语言修辞的意义，而且具有一种观照世界的生命态度的意义。鲁迅的反讽思想受到了尼采、克尔凯郭尔等西方哲学家的影响，用反讽理论研究鲁迅的期刊论文以及涉及这些内容的博士论文共有十余篇。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已经受到了克尔凯郭尔的影响。当时鲁迅购读的克尔凯郭尔著作主要有《诱惑者日记》以及克尔凯郭尔和女友的通信集《索伦·克尔凯郭尔及其对“她”的关系》，另有德文传记《作为哲学家的索伦·克尔凯郭尔》。1935年11月，鲁迅又购入《克尔凯郭尔选集》、《恐惧的概念》等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关于鲁迅反讽精神的研究，龚敏律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西方反讽诗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存在之魂：鲁迅小说中的反讽诗学”为题的第二章，从“鲁迅反讽现象研究的历史与发展”、“面对一切的质疑和批判”、“生存悖论的绝望与解嘲”、“存在意义上的虚无感”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在当今世界，生存的意义和个人的价值仍然是人们普遍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没有反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生”^{[2]283}，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反讽几乎可以说是人生最高至美的境界。以反讽的人生观为中心，观照鲁迅和夏目漱石在现代的“文明开化”进程中所承受的个人以及国家、民族的痛苦，彷徨与艰难的选择，深入地思考和探索生存的意义和个人的价值，即使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会很有意义。

二、本课题的研究历史与现状

对于鲁迅与夏目漱石的比较研究，除了单篇论文以外，中国学者在数部论“中日文学关系”的著作中也有专章论述。如刘柏青：《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1985），张福贵、靳丛林：《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

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等。此外,日本学者出版了两部专著,即桧山久雄的《鲁迅与漱石》与藤井省三的《俄罗斯的影——夏目漱石与鲁迅》。

桧山久雄认为鲁迅和夏目漱石生活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仍然是革命的时代,从而鲁迅和夏目漱石的恶战苦斗对当时的日本社会具有借鉴意义。为此,桧山久雄考察鲁迅的《阿Q正传》对中国国民性的形象描画,以及鲁迅改造国民性的艰难历程,其中重点阐述了鲁迅先生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桧山久雄叙述夏目漱石对社会的批判,分析夏目漱石的个人主义主张,重点阐述了夏目漱石的“自我本位”的思想以及最终走向“则天去私”的过程。桧山久雄侧重于对鲁迅和夏目漱石金刚怒目一面的阐述,以期对当时社会有所启发。

藤井省三在《俄罗斯的影——夏目漱石与鲁迅》中阐述了俄国作家安德烈夫对鲁迅和夏目漱石的影响。安德烈夫(1871—1917)是俄罗斯作家、戏剧家,十月革命后流亡芬兰。藤井省三认为虽然安德烈夫几乎被人忘却,但是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他不仅仅在俄罗斯,在欧美、日本、中国都是很受欢迎的文学家。安德烈夫是鲁迅青年时代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鲁迅称他为“二十世纪初俄国有名的著作者”^{[3]185},并曾亲自翻译过他的《默》、《漫》、《黯淡的烟霭里》、《书籍》等短篇小说。鲁迅认为安德烈夫的作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安特莱夫^①式的阴冷”^{[4]239}。鲁迅的短篇小说《药》的结尾明显借鉴了这种手法。藤井省三认为在夏目漱石体验中以及在他的作品中也有“安特莱夫式的阴冷”。藤井省三分析了鲁迅、夏目漱石生活的时代与俄国的相似之处,重点分析了风起云涌的中国革命以及影响日本深远的“大逆事件”,得出结论:社会环境的相似性是鲁迅、夏目漱石接受安德烈夫文学的基础。

三、本课题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方法

本书《鲁迅与夏目漱石》是从鲁迅和夏目漱石的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等几个方面展开比较研究,最后以第四章反讽观的比较作为收束。论

① 通译:安德烈夫。

文第一章“出世与入世”分析比较鲁迅和夏目漱石的人生观，分析鲁迅和夏目漱石对老子哲学的认同与超越，并通过《野草》与《梦十夜》的作品分析，阐述他们的“出世与入世”思想。第二章“改良与革命”，重点阐述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和夏目漱石的个人主义，同时也分析暴虐统治与国民性格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阐述鲁迅和夏目漱石对于人的解放所选择的不同道路。第三章“为人生”与“余裕”，分析比较鲁迅和夏目漱石的文学观。“为人生”与“余裕”看起来是相反的两面，但表现在鲁迅、夏目漱石的身上，却是一体两面，相反相成。在前三章中，没有提到“反讽”这个词，但又无不与反讽的人生观相关联。反讽的人生观看似与出世者的人生观相似，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入世”是通向反讽境界的必不可少的阶梯，入世思想就成为反讽观不能不研究的内容，这样，在第二章中研究比较鲁迅和夏目漱石作为文学家改造社会的雄心抱负和业绩也就顺理成章；同时，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与争取人的解放的努力以及夏目漱石的个人主义思想又是反讽人生观的参照样本。而入世与出世思想体现在文学观上也就是“为人生”与“余裕”的对峙与纠结。在上述三章的基础上，本文得以展开第四章关于反讽观的论述。第四章从鲁迅与夏目漱石的“反讽思想的形成”、“自我本位与观世如戏”以及“反讽的品质”等三方面分析比较。

本论文主要采用比较文学中平行研究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在比较文学中，所谓“平行研究”，“就是要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者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者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同异，并导出有益的结论。”^{[5]123}鲁迅和夏目漱石存在着一些直接关系，但从比较两位作家而导出的“有益结论”主要来自他们历史文化处境与思想的“卓然可比”。本论文始终力避把“比较文学”搞成“文学比较”。陈寅恪曾就“文学比较”的穿凿附会现象提出过自己的真知灼见：“西晋之世，僧徒有竺法雅者，取内典外书以相拟配，名曰‘格义’，实为赤县神州附会中西学说之初祖，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称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

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哥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谓研究可言矣。”^{[6]113-114}笔者以为，陈先生的本意并不是只承认“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而否定“平行研究”的意义，他是在提醒：比较文学研究必须注重“历史演变”和“系统异同”。这也是本文研究与写作过程中秉持的观念。

总之，笔者在研究中将努力克服“文学比较”的弊端，把比较视域作为研究展开的本体，注重比较对象内在的会通与整合，以此对相关的东西方文化及学术知识进行咀嚼、消化，以实现通过比较而深化鲁迅文学研究以及夏目漱石文学研究的目标。

目 录

绪 论

一、选题意义	/001
二、本课题的研究历史与现状	/002
三、本课题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方法	/003

第一章

出世与入世	/003
第一节 对老庄哲学的认同与超越	/004
一、夏目漱石与《老子哲学》	/004
二、“则天去私”与老庄哲学	/007
三、从《摩罗诗力说》到《老庄》《出关》《起死》	/012
四、对陶渊明的解读和取舍	/017
第二节 《野草》与《梦十夜》	/021
一、罪	/022
二、悟	/028

第二章

革命与改良	/039
第一节 暴虐统治对国民性格的影响	/040

一、“独夫”的“凶酷残虐”与“大逆事件”	/040
二、农民养老保障模式研究综述二、不同道路的选择	/047
第二节 国民思想的改造	/054
一、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055
二、夏目漱石的个人主义	/061
三、妇女的解放与改造	/067

第三章

“为人生”与“余裕”	/081
第一节 为人生的文学观	/081
一、“文艺家不是闲人”	/081
二、“为人生”的文学	/088
第二节 余裕观	/095
一、“轻快洒脱”与“深刻沉重”	/095
二、余裕的文学与文学的余裕	/101
第三节 关于两个文学论争	/108
一、反对文坛霸道的嘴脸	/109
二、让文学回归本来的位置	/112
三、文学与社会谐和	/117

第四章

鲁迅、夏目漱石文学中的反讽	/125
第一节 反讽思想的形成	/128
一、失望于世态人情的凉薄	/128
二、不完满的婚姻	/131
三、理想的破灭	/135
第二节 自我本位与观世如戏	/139

一、自我本位	/139
二、观世如戏	/143
第三节 反讽的品质	/149
一、对落后丑陋的揭露	/150
二、对光明美好的质疑	/157
结 语	/164
参考文献	/168
后 记	/184

第一章

DIYIZHANG



第一章

（此处文字模糊，无法辨识）

出世与入世

孔子曾对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7]70}意思是：受重用时，就展露才华；不受重用时，就退隐田园。只有我和你能做到！“退隐”可以说就是“出世”，出世思想，通常认为最早出自老子的《道德经》，而孔子则是入世精神的代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入世思想与出世思想并存，构成颉颃互竞的局面。

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鲁迅和夏目漱石不能不受到孔子、老子思想的影响，产生入世与出世的纠结。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当时鲁迅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同时还在大学兼任任教，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但是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留学时代的，不知补过多少回。鲁迅的母亲实在看不过，就叫朱安做了一条新棉裤，等鲁迅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不料竟被鲁迅扔了出来。孙伏园劝说的时候，鲁迅先生说：“一个独身者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8]50}鲁迅把自己的生活标准降到最低，不为身家，不为名利，可以说是出世精神的一种体现。夏目漱石也如此，据夏目漱石的夫人镜子回忆，新婚不久，漱石就对她声明：“自己是搞学问的，必须学习，不可能照顾她。”^{[9]35}鲁迅、夏目漱石不考虑个人的进退荣辱，而把精力都花在工作上，一心为国家为民众。鲁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10]130}，坚持绝望的反抗；夏目漱石进行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与社会上利己主义思想不懈斗争，又都是入世精神的生动写照。这正是人们常说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换一种说法就是“出世为体、入世为用”。

本章就以“出世与入世”为切入点，从“对老庄哲学的认同与超越”

以及“《野草》与《梦十夜》的比较”两个方面分析鲁迅、夏目漱石的人生观。

第一节 对老庄哲学的认同与超越

老子和庄子所代表的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支，鲁迅和夏目漱石对道家思想的态度非常复杂。本节从“漱石与《老子哲学》”、“则天去私与老子哲学”、“从《摩罗诗力说》到《老庄》、《出关》、《起死》”以及“陶渊明的出世与入世”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夏目漱石与《老子哲学》^①

1892年6月，25岁的夏目漱石作为东京大学文学部英文科的二年级学生，写出了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论文《老子哲学》。论文分四个部分：总论、老子的修身、老子的治民、老子的道。夏目漱石阐述老子的修身思想，认为老子废学问，废行为，废多言，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回归于婴儿的主张，达到知足、“柔而不争，卑而不亢”^{[11]269}的境界。在治国方面，夏目漱石阐述老子的观点：得天下的途径是不为天下先以及守道，而得了天下之后应该政治清明，其中心就是“无为”。

夏目漱石在论文中对老子哲学除了客观的阐述，大多是否定的评价，对于他以为的不足之处，长篇大论直刺其非。他认为老子哲学存在以下两方面错误：

（一）老子哲学不科学，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夏目漱石说：“老子所言与动物进化的原则相反，违背事物发展规律。人身心的构造是根据外界环境慢慢地、有机地进化。儿子继承了父亲，父亲继承了祖父，祖父又继承先祖的基因。每个独立的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社会不断发展，企图通过回归太古结绳记事的社会，从而达到自由自在，是不可能

^① 本节内容参照夏目漱石：《老子的哲学》，《夏目漱石全集》第9卷，筑摩书房，1971年，第265-276页。

的。”^{[11]272}谈到老子的学问无用观，夏目漱石引用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诗句^①：

A Poet, one who loves the brooks

Far better than the sages' books^{[11]267}

笔者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一个诗人，他深爱潺潺的小溪，远胜于爱圣贤的书籍。漱石认为威廉·华兹华斯只爱天然的书不爱圣贤书的观点和老子相似。尽管如此，夏目漱石仍然直指老子理论上的缺陷，他说：“只着眼于形而下的‘末’，就不能形成高明的世界观。”^{[11]267}批评老子“一方面厌恶凭借学问钻研事理，一方面又把利用经验探究客观规律当作徒劳，然而只从外界得到很少的一点知识却企图形成高明的世界观，只能是妄想。”^{[11]268}假如没有得到非凡的人的影响，一点知识也没有学习，只受到外物支配，贤愚圣凡的差别也不知道，老子也不可能形成豁达的世界观；既然能形成豁达的世界观就一定得到外界的帮助。老子推崇结绳的古民那样“无为”，重视“无为”、弃绝学问、废除观察的观点在现代不免受到非议。夏目漱石批评说老子的理论是建立在空想之上，老子设想世界回归结绳时代，达到“无为”的境界，但问题是世界再也不会回到结绳记事的时代了。即使回到那样的时代，结绳穴居也需要智慧，何况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也不能没有智慧。甘与不甘相对，美与不美相对，安与不安相对，乐与不乐相伴相对，没有比较怎知甘美安乐，这也需要智慧。夏目漱石总结说：“老子运用智慧通过推理而想象的观点主张，很明显不能适用实际的世界。”^{[11]272}

（二）老子哲学不能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而常常混淆是非，一概而论。夏目漱石批评老子“用一只眼观察世界，没有比较对照事物相对的两面、权衡得失利害，而只看到事物丑恶的一面，无论好坏都一撞百碎。”^{[11]273}认为老子只看到事物两面的联系，而没有分析它们的差别，“这就好像算术里的减法，二减一的差与一万减一的差竟看作相等；同样，从非常崇高的玄的世界，观察善恶美丑，竟看不出丝毫差别。这就

① 题目是：The Idle Shepherd - boys.

像是在相对的世界中引入无限，以无限的尺度来度量相对的长短一样不适合。这在学理上也许偶然适用，而政治上不可能通用。”^{[11]273}这里表现出夏目漱石关注的焦点以及思考的指向。

夏目漱石把老子哲学作为研究对象时，认为应该对老子哲学有很高的评价，达到崇拜的地步也不为过。在总论中引用孔子的话称赞老子，“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12]2140}然而，如果把这种赞扬和后文的批评相比，这赞扬就显得非常空洞。

有意思的是，夏目漱石不是孤立地谈论老子哲学，而是在与孔孟思想进行比较的视野中，来分析老子思想的独特价值。他开篇就在总论中把孟子的“盖反其本矣”与老子的“言其事好还”作比较。“盖反其本矣”出自于《齐桓晋文之事》，孟子指出齐宣王要以区区之齐国去战胜八倍于自己的各诸侯国是多么愚蠢，奉劝齐宣王“盖反其本矣”，意思是：还是返回到根本上来吧。其根本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发政施仁”，也就是说要停止有害无益的战争，回归王道，施仁政以让人民归服。“其事好还”出自于《道德经》第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13]77}夏目漱石说，不论是孟子的“盖反其本矣”还是老子的“其事好还”都是“希望世人弃末复本”^{[11]265}。夏目漱石把他们观点相似的原因归之于孟子和老子“都生于争乱浇漓的乱世，都有感于世人对功名利欲趋之若鹜的社会现实”^{[11]273}。但夏目漱石又发现孟子的“本”与老子的“本”也有相异之处。孟子相信的“本”是发扬恻隐之心的仁，是唤起人们羞恶之心的义。孟子认为邪恶并不是天生的，仁义是人心中本来就有的，深埋在人们心中，只是这仁义之心的展现有或多或少的障碍。孟子还认为仁义治国就能有好的结果。这主张在周朝末年污浊的社会环境中很难说有什么大用，当时致力于合纵连横的各诸侯国根本不可能接受仁义思想，时人也以“迂腐”评价孔孟学说。夏目漱石认为老子的“无为”思想比起儒家学说“更加高远，也更加迂阔”^{[11]266}。

对于老子的整体思想而言，夏目漱石注重的是“修身”和“治国”，这体现了他研究的价值取向。简言之，夏目漱石虽然研修西洋文学，但其思想深处还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修齐治平”成为贯穿其一生思想与行为的一条红线。他写作《老子哲学》时有强烈的